

日本汉诗概说

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字写成的中国古代诗歌式的诗。日本汉诗不仅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影响并繁衍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它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重要纽带，是两国文化交孕而生的文学瑰宝，也是世界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璀璨的奇迹。日本汉诗在其一千三百余年发展史上，产生过数以千计的诗人 and 数十万首诗篇，成绩斐然，蔚为大观。

日本汉诗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王朝时期(646—1192)

此时期包括了日本历史上的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是日本汉诗的缘起时期。

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公元 285 年，当百济国（朝鲜古国之一）博士王仁被日本国特聘为皇太子之师而赴日时，带去了《论语》和《千字文》。（这是史书上的正式记载，而实际上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当更早。）此后，在皇室贵族、朝廷大臣的带动下，日本逐渐兴起了历久不衰的学习汉文化的热潮。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连连派出，中日两国友好外交的不断升温，成为日本汉诗产生的契机。正如日本汉诗研究专家猪口笃志所说的那样：

“因为唐代是诗的全盛时代，所以日本人学作汉诗不仅仅是个人的趣味爱好，而且是与中国人交际时和进而在外交来往时的一种不可缺欠的教养。”（《日本汉诗鉴赏辞典序》）

日本汉诗源起于天智天皇（626—671）时代。他做皇子时就领导了著名的大化改新（646），即位后积极推进与唐朝的友好关系。665年唐使刘德高访日，他随即派出遣唐使回访；669年他又遣使访唐，唐朝随即派答使郭务悰率随员二千余人访日，盛况空前。日本汉诗正是在中日双方如此频繁的交往应酬中逐渐产生的。

其皇子大友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汉诗人。大友皇子（648—672）曾任太政大臣，天智天皇死后，在与大海人皇子（天智天皇之弟，即位为天武天皇）角逐皇位的壬申之乱中兵败自杀，时年25岁。明治三年（1870），追谥为弘文天皇。在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存了他的《侍宴》、《述怀》两首诗。《述怀》云：

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
羞无监抚术，安能临四海。

江户时代著名汉诗评论家江村北海在其《日本诗史》中评此诗云：“典重浑朴，为词坛鼻祖而无愧者也。”明治时代著名汉诗人国分青崖在《日本诗话丛书题词》中亦云：

弘文聪睿焕奎章，东海诗流此滥觞。
仰诵皇明光日月，于今艺苑祖君王。

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编定于751年，比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编成还早十年左右。《怀风藻》受齐梁及唐初诗风影响，多应诏侍宴之作。形式以五言八句为主，好用偶而多不合律。

此后，嵯峨天皇授命编纂的《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及淳和天皇授命编纂的《经国集》（827）这所谓“敕撰三集”的产生，把日本汉诗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三集的诗风明显受了唐诗的影响，七言诗增加了，平仄也渐趋于谐和。

从10世纪初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900）、《菅家后集》（903）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日本久久盛行的所谓“白乐天风”的影响。

唐末，遣唐使废止。与中国交往的中断使涓涓细流的日本汉诗陷入沉滞状态，在各种名目的赛诗会上，汉诗走向了游戏化、竞技化的形式主义道路。

王朝时期的主要汉诗人，在大和时代，除大友皇子外，还有大津皇子、中岛大臣、文武天皇等。在奈良时代，有长屋王、刀宣利令、藤原宇合、藤原万里、麻田阳春、大伴池主、阿倍仲麻吕（唐朝朝衡）等。在平安时代，有嵯峨天皇、小野岑守、巨势识人、空海、有智子公主、小野篁、都良香、岛田忠臣、菅原道真、纪长谷雄、大江朝纲、菅原文时、橘直干、大江匡房、藤原忠通等。

王朝时期的汉诗文总集，除“敕撰三集”外，还有《扶桑集》（998）、《本朝丽藻》（1010）、《和汉朗咏集》（1013）、《本朝文粹》（1045）、《朝野群载》（1116）、《新撰和汉朗咏集》（1138）及《本朝无题诗》（1162—1164）等；别集除菅原道真外，还有空海的《性灵集》（835）、都良香的《都氏文集》（879）、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892）等。

值得一提的是，空海806年自唐归日后潜心著述的介绍六朝及唐诗文作法和诗论的《文镜秘府论》（820）及摘其要而成书的《文笔眼心抄》（同年），正是适应了当时日本汉诗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五山时期(1192—1602)

此时期包括日本历史上的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这是日本汉诗重得源头活水后得以缓慢发展的时期。

12世纪末，皇室衰微，武士崛起，政权归于将军幕府，文化中心也随之由朝廷转向了受幕府控制和庇护的“五山十刹”——京都五山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以及五山之首南禅寺。当时，中日交通仍被阻隔，而西渡求法的日本禅僧和东渡传法的中国禅僧却可以比较自由地往来其间。他们在交流佛教的同时也进行着汉诗文的交流，日本汉诗遂因此而不断地得到了“源头活水”。这一时期的汉诗文作者主要是五山禅僧，所以一般称此时期之文学为“五山文学”。五山时期的汉诗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王朝时期，其诗风也由几乎单宗白居易转为对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诸多唐宋诗人的景慕和模仿。由于禅僧往往诗与偈并作，诗境与禅境相融，所以一般说来五山汉诗受喜好说理的宋诗的影响尤深。

五山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是绝海中津（1336—1405，有《蕉坚稿》）和义堂周信（1325—1388，有《空华集》），其次是虎关师炼（1278—1346，有《济北集》）、中岩圆月（1300—1375，有《东海一沕集》）和雪村友梅（1290—1346，有《岷峨集》）。

五山诗集以别集为多，总集仅有《北斗集》、《花上集》等。

三、江户时期(1603—1868)

从江户（今东京）幕府的创设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历史上称为江户时代。这是日本汉诗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

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603—1708），儒者文学的兴起。

其先行者是日本宋学奠基人一代名儒藤原惺窝。惺窝专力于程朱理学，而以余力为诗文，影响很大，门生众多。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堀杏庵、那波道圆在经学方面最为著名，有“四天王”之称。而以诗论，则成就最高的当数石川丈山，其次为那波道圆。

松永尺五的门人木下顺庵不满五山诗风而首倡恢复唐诗，荻生徂徕曾肯定其功绩说：“锦里先生（顺庵又号锦里）出而扶桑之诗皆唐。”服部南郭亦云：“锦里先生实为文运之嚆矢。其诗虽不甚工，但首唱唐风。”顺庵门下英才辈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新井白石、室鸠巢、雨森芳洲和祇园南海。

第二阶段（1709—1750），讓园古文辞复古派的盛行。

讓园是荻生徂徕的宅舍名，后因以为号。为廓清朱子学影响和荡涤五山余风，荻生徂徕接过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开创日本古文辞派，以复古为己任，排斥宋诗，鼓吹唐诗，奉李攀龙之论为圭臬，以假其名而編集之《唐诗选》为作诗者必读之书。徂徕门生极多，其中太宰春台、山县周南、服部南郭、高野兰亭、平野金华、释大潮、释万庵等皆以诗名。讓园之学风靡日本六七十年，直至他死后还久盛不衰。这对于唐诗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讓园派同明前后七子一样，也存在着刻意模拟古人的弊病。

第三阶段（1751—1803），清新宋诗风的勃兴。

这一时期，日本汉诗坛掀起了批判讓园流弊的浪潮。一方面，在理论上，山本北山所著《作文志毅》、《作诗志毅》、《孝经楼诗话》，市河宽斋所著《谈唐诗选》，津阪东阳所著《夜航诗话》，太宰春台所著《文论》、《诗论》，大洼诗佛所著《诗圣堂诗话》，久保甫学所著《木石园诗话》等，鼓吹宋诗，指斥《唐诗选》，倡袁

中郎（宏道）之清新，排击李（攀龙）王（世贞）之模拟剽窃，其势迅猛不可当。而此际之鼓吹宋诗，与五山禅僧之喜宋诗好谈性理已经不同。此际诗人，往往以放翁、诚斋为宗，得其自然清新之趣。此阶段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使汉诗坛呈现出空前繁荣，其最杰出者，有龙草庐、柴野栗山、尾藤二洲、古贺精里、赖春水、赖杏坪、菅茶山、释六如（慈周）、释大典、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大洼诗佛等。

经学上无休止的论争终于导致了宽政二年（1790）的“异学之禁”。此后惟朱子学是官学，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学说均被列为“异学”而遭禁止。异学之禁虽因受到普遍反对后来不得不草草收场，但它却使经术之学从此失去活气，举世重词章，诗人开始独立于学者之外，这对于日本汉诗的走向大众化和达到空前繁荣，是一个重要转机。

第四阶段（1804—1868），日本汉诗百花绚烂的极盛时期。

此阶段的主要诗人，除前阶段的柴野栗山、尾藤二洲、古贺精里、赖春水、赖杏坪、菅茶山、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大洼诗佛等继续活跃外，新起的诗人有草场佩川、梁川星岩、广濑淡窗、广濑旭庄、大槻磐溪、斋藤拙堂、赖山阳、森春涛、大沼枕山、藤井竹外、安积良斋、佐藤一斋、菊池五山及女诗人江马细香、梁川红兰等。诗人布及僻远，诗艺臻于完熟，日本汉诗日益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至江户末期，内外多事，幕府衰替，维新胎动，诗文亦为之一变，忧国志士慷慨悲壮之歌如雷如电如雨如风，给日本汉诗注入了新的生命。

江户时代的汉诗文总集极其繁富，有按师承门派编选者，如《木门十四家诗集》收木下顺庵门下十四家诗 476 首，《護园录稿》，收徠徠门下四十九家诗 340 首，《宜园百家诗》初、二、三编，收广濑淡窗、旭庄兄弟门下及有关者五百一十九家诗二十卷

等；有按时代及体裁编选者，如文政十二年（1829）刊《文政十七家绝句》500首、天保九年（1838）刊《天保三十六家绝句》925首、嘉永元年（1848）刊《嘉永二十五家绝句》966首、安政四年（1857）刊《安政三十二家绝句》749首、文久二年（1862）刊《文久二十六家绝句》618首、庆应二年（1866）刊《庆应十家绝句》300首等；有按地域编选者，如《三备诗选》收备前、备中（今皆属冈山县）、备后（今属广岛县）三地七十九家诗237首、《三野风雅》收三野（美浓旧称，今属岐阜县）二百家诗1000首等；此外，如《日本咏物诗》收一百三十四家咏物诗545首，《采风集》收清新性灵派一百七十九家诗三卷等，亦各有特色。于此应特别指出的是江村北海所编《日本诗选》正编十卷、续编八卷，辑录了江户时期五百零二家诗；市河宽斋所编《日本诗纪》五十卷及卷外集、别集、系谱各一卷，编辑了王朝时期四百二十家诗3204首，句527条；友野霞舟所编《熙朝诗荟》一百卷，编辑了江户时期一千四百六十七家诗14318首。这是江户时代编选的最大三部汉诗总集，被称为日本汉诗之大观。即此，可以窥见江户时代日本汉诗的全盛气象。

四、维新(1868)以后

这是日本汉诗从全盛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治时代。

明治前期（1868—1889）
1868—1911）活跃于汉诗坛的有三个派系——广濑淡窗咸宜园的一门、冈本花亭的一门、梁川星岩的一门，而以星岩门下之大沼枕山、小野湖山、森春涛影响最大。明治初的诗社有铃木松塘的七曲吟社、向山黄村的晚翠吟社、冈本黄石的曲坊吟社等，而以大沼枕山的下谷吟社影响最大。明治七年森春涛

结茉莉吟社，其声势又超过下谷吟社。森春涛倡清诗，使明治诗风为之一变。

明治后期（1890—1911），森槐南（春涛之子）主盟的星社成为汉诗坛的中心，参加者有国分青崖、本田种竹、野口宁斋等。当时的吟社，还有小野湖山的优游吟社、福井学圃的涵泳吟社、田边莲舟的昔社、关泽霞庵的云门会、大江敬香的花月会等。

明治时期汉诗文杂志的创刊（如《鸥梦新志》、《明诗综》、《百花栏》、《随鸥集》等）和报纸上汉诗专栏的设立（如《每日新闻》的“沧海拾珠”专栏、《日本新闻》的“文苑”专栏等）为汉诗的发表开了一个新的渠道，成为明治汉诗坛的一个特色。

明治汉诗坛虽还有过一时的繁荣，但江户时代的全盛景象已不复可再。维新以后，一方面，日本的兴趣与目光已转向西方科学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晚清的诗坛也已少有活力，日本汉诗与曾经为其源头并不断向其注入过活水的中国古代诗歌几乎同时走向衰微，也是情理中事。

第二阶段（1912年以后），大正、昭和时代。

随着西学的隆兴，汉学一步步走向衰落。汉诗坛上虽有国分青崖极力撑持，一人主盟了雅文会、咏社、兴社、兰社、朴社等许多诗社，并扶助着随鸥吟社和艺文社，却不但再难唤回汉诗的青春，反而更显出诗坛的索漠荒寂。待到后来连报纸上也很少再设汉诗专栏时，汉诗也就随之淡出社会生活。

以上，是对日本汉诗发展史的一个极疏略的概括。

在此，还应当说明的是，自 9 世纪末遣唐使废止以后，日本汉诗人几乎都不谙华音，就是说，对于汉语，既听不懂，更不能说。但日本人是使用汉字的，能识其形而明其义，于是便发明了“训读法”来译读汉诗文。训读法与音读法相对，建立在对汉字词语进行训解的基础之上。训读的汉诗，虽然在汉字间夹缀了一些

日语假名(字母)并按日语语法挪动了某些字词的位置，且失去了华音，读出来只有日本人才听得懂，但汉字却几乎完全被保留下来。正是通过汉字，日本人得以充分地理解和把握汉诗的真谛，欣赏到汉诗的真味。不难想象，他们写作汉诗，要远比我们中国人困难得多。可以说，正是对于汉文化、汉文学的由衷而持久的向慕，才使他们有那样的勇气和毅力，一代一代不懈地追求着，摸索着，开拓着，积累着学习和写作汉诗的经验，一千三百余年如一日，这是一个怎样艰苦的历程！

训读法的缺憾是失去了汉诗的音韵美，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不过日本汉诗人在写作汉诗时，却是严守音韵格律的。这种认真态度一直延续至今，现在日本出版的任何中日汉诗选本，必逐一注明每首诗所押何韵、韵脚何在，即是一例。

明治以后，日本文学史的编写，遵循西方只论述本民族语言所写文学的惯例，只注意和文学，冷落了汉文学。这种有违日本文学发展历史的倾向，严重阻滞了日本汉文学的整理和研究。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日本国内，日本汉文学开始愈来愈多地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注意。以汲古书院刊十一卷本《词华集日本汉诗》、二十卷本《诗集日本汉诗》、四卷本《纪行日本汉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的日本汉诗总集别集相继出版了，以山岸德平著汲古书院刊《近世汉文学史》、猪口笃志著角川书店刊《日本汉文学史》以及日野龙夫等编纂岩波书店刊十卷本《江户诗人选集》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汉诗研究专著相继问世了。清代著名学者俞樾(曲园)编选的《东瀛诗选》也由汲古书院出版，还有近藤春雄著明治书院刊《日本汉文学大事典》等工具书的出版，以及雨后春笋般大量发表的日本汉文学研究论文，这一切，说明以日本汉诗为主体的日本汉文学研究的高潮正在到来。

近年，国内学者也已经开始留意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诗曾经产生过怎样的国际影响，所谓“汉字文化圈”和域外汉文学的

研究虽不过涓涓细流，却也已初起波澜。我想，中日两国关于汉诗研究的这两股潮流若能相互沟通以至合流，必将出现更蔚然可观之景象。

今荟萃日本汉诗之精华——诗三百首、句四百联——以成此书，区区之心，将欲顺其势，推其波，而助其澜也。料谬误之处难免，恳望中日学者及广大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本文原为拙著《日本汉诗三百首》[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1994年9月出版]自序）

日本汉诗的运命

一种文学艺术，其价值的充分实现，不仅是当其被创作出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当其广泛地被欣赏、被批评的时候。由于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语言的、地域的种种原因，日本汉诗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孕而生的文学瑰宝，迄今还没有得到它本来应该得到的与它的巨大成就相应的更广泛的欣赏和批评，因而还未能充分实现其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日本汉诗的运命是近于寂寞的，它的绚丽的光华和人文价值还在很大程度上被埋没着。

努力改变这一运命，我想，是日本与中国汉诗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共同使命。当今，中日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已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料，当在日本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发展史，拥有数以千计的诗人 and 数十万首诗篇的日本汉诗，一旦被多形式多渠道地充分地介绍到汉诗的发祥地中国去的时候，必将引起广泛的兴趣，受到热情的欣赏和批评。中国的汉诗研究者在喜获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时候，会感到若不对日本汉诗做一点基本的必要的研究——可以视为是对于中国古诗的“域外追踪研究”，则自己的研究将是不完全的研究；而中国的情况，反过来又必将给日本的汉诗研究者以鼓舞。果能如此，则对中国古诗与日本汉诗的研究，都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一、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

日本汉诗与中国古代诗歌，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久远的复杂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至今仍然是影响日本汉诗命运的重要因素。为了说明把日本汉诗介绍到中国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有必要对日本汉诗与中国古诗间的亲缘关系作一最基本的考察。

（一）日本汉诗的源头在中国

日本汉诗在自己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史上，虽也经历了缘起、发展、全盛、衰落的全过程，但是，与同为日本诗歌的和歌相比，源头却很不同。和歌是源于日本民间的本土文学，日本汉诗的源头却在中国。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日本诗话丛书》卷一）开篇云：

按史，应神天皇十五年，百济国博士阿直几来朝，献《周易》、《论语》、《孝经》等书。上悦，使阿直几授经诸皇子。我邦经学，盖肇于此云。后阿直几荐王仁，上乃诏百济王征王仁。王仁至，与阿直几同侍讲诸皇子。上崩，仁德天皇即位，迁都浪速，王仁献《梅花颂》，所谓三十一言和歌者也。或曰：“异域之人，何以作和歌？所献或是诗章，当时史臣译通其义耳。”或曰：“王仁归化既久，熟我邦语言，学作和歌。”未知孰是也。要之距今千有四百年，载籍罕传，其详不可得而知也。自仁德升遐，历世三十，经年四百五十，天智天皇登极，而后鸾凤扬音，圭璧发彩，艺文始足商榷云。

史称，诗赋之兴，自大津王始。纪淑望亦曰：“皇子大津始作诗赋。”而其实大友皇子为始，河岛王、大津王次之。大友诗，五言四句：“道德承天训，盐梅寄真宰。羞无监抚术，

安能临四海。”典重浑朴，为词坛鼻祖而无愧者也。大友，天智太子。

(按：313—399年仁德天皇在位，661—671年天智天皇在位，则“自仁德升遐”至“天智天皇登极”仅263年，此云“经年四百五十”，疑误。)在这段有关汉籍传入与汉诗起源的重要论述中，还涉及到了和歌。虽云“未知孰是”，但无论是“当时史臣译通其义”，还是王仁“学作和歌”，只要这一史料属实，均可说明当汉籍传入之前，日本早已有“三十一言和歌”存在。

日本汉诗为什么源起于天智天皇时期？对此，猪口笃志在《日本汉诗概说》（其所著《日本汉诗》一书之序）中曾有扼要说明，摘录如下：

与隋唐的交通和亲，进一步推动了汉文学的兴盛，并使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因为唐朝是汉诗的全盛时代，所以日本人作汉诗不仅仅是一种好尚，而且是与中国人交往时必要的不可欠缺的教养。七年，齐明天皇崩御，大兄皇子即位为天智天皇，天皇学奉周公孔子之道，整顿学制，振兴文教，于万机之暇招学士大夫赐宴赋诗。四年（665）九月，唐使刘得高来朝，我方遣唐使回访；六年（667），迁都近江，八年（669），遣使赴唐，唐又派答使郭务惊率随员二千余人回访，盛况空前。在如此频繁的交往中，彼我使臣之间想必会有不少相互酬答的诗作。所以，日本汉诗起源于天智天皇时代决非偶然。

这段论述，不但把日本汉诗的缘起置于日本与隋唐交亲的广阔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而且对日本人最初写作汉诗的动机也有所推断，即当时写作汉诗不仅仅是一种好尚，而且被视为与汉诗全盛期的

中国人交际时的一种必要的文化教养。如此说来，当日本汉诗最初产生之时，就把汉诗故乡的中国人视为重要的读者对象了。从日本汉诗源于中国古诗这层源流关系来看，早期日本汉诗人的这种想法非常自然。当时空前频繁的中日人员往来，确实为中日间诗人的直接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可能。

（二）日本汉诗对中国诗歌的不断受容

日本汉诗之以中国诗歌为源，不仅仅是当其缘起的时候，在其后来的发展中，仍需要中国诗歌的源源注入，仍需要为了更新而不断吸纳借鉴。中国诗歌在其自身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又一个重要浪潮，大都在经过相当时期以后波及日本汉诗。诚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四所云：

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秩然相别。……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胡知其然？《怀风》（日本第一部汉诗集，公元 751 年编成）、《凌云》（日本第一部敕撰汉诗集，公元 814 年编成）二集所收五言四韵，世以为律诗，非也。其诗对偶虽备，声律未协，是古诗渐变为近体，齐梁陈隋，渐多其作，我邦承其气运者。稽其年代，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为唐中宗嗣圣十四年，（按，应为“十八年”）上距梁武帝天监元年，凡二百年。弘仁、天长，仿佛初唐，天历、应和，崇尚元白，并髦勉乎百年之后。五山诗学之盛，当明中世，在彼则李、何、王、李，唱复古于前后，在此则南宋北元，专传播于一时。其距宋元之际，亦二百年矣。我元禄，距明嘉靖，亦复二百年，则七子诗当行于我邦，气运已符，故

有先于徂徠已称扬七子者。

诗风之变迁，往往是积渐而成势，难于确指以年月，且即使同一时代，诗风也有主有次，未可划一。此处所云“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者，乃是概言其趋势而已。在此应该指出的是，日本汉诗对于中国诗歌的这种依存性，固然表现了两两者之间亲缘关系的继续与深化，但同时应看到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视日本汉诗内部诸因素的矛盾斗争在其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尤其是当日本汉诗已逐渐成熟，显示出独立性之后，它对中国汉诗的借鉴、呼应，其目的除了汲取营养之外，有时还是为了内部矛盾斗争的需要。尤其是江户时代以来，诗人的个性化已十分突出，尊唐崇宋、仿明学清，主张既莫衷一是，作品亦五彩缤纷，所谓“大抵二百年”的话已经不能适用。及至明治之后，一方面日本的兴趣已转向西方科学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晚清诗坛也已少有生气，于是，日本汉诗就和曾经作为它的源头并曾不断向它注入过活水的中国古诗几乎同时走向了衰微。

（三）对日本汉诗的评价向以中国诗歌为标准

日本汉诗有所谓“和臭（亦写作“和习”、“倭臭”、“倭习”，发音同）问题。近藤春雄《日本汉文学大事典》“和习”条云：

日本人作汉诗文时表现出的有异于华人的独特的习惯或用法。即在诗文中夹杂日本式字句，使人总觉得有日本人作文习气。江户时代山本北山在其《作诗志彀》中曾对和习进行了批评。赖山阳《日本外史》有云：“唉，长袖者恶，不知兵（《源氏记》），称公卿为“长袖者”；还有云：“九郎为式舞”，将国语中的“二舞”，径写入汉文作“式舞”等。都^四

和习

按，山本北山在《作诗志彙》中所指摘的，多为字词之误用，如针对诗题中的“秋田城，往昔秋田城介所据也”，指出：“‘所据’之用甚谬，当为‘所镇’。‘据’‘镇’二字，倭人所用多谬”等。

再如卢玄淳《诗语考附录》所举“此方人，‘请看’，作‘请见’，‘请听’作‘请闻’，之类，于义有害，易生误解，确实是应当尽量避免的。

至于将日本独有的事物写入诗中，作一创造，则似未可一概而论。例如菊池五山在其《五山堂诗话》中评价宇庞卿诗云：“‘月新题ノ字’，五字亦佳。”径将日本片假名文字“ノ”写进汉诗里来了，可谓“和臭”很浓，但“ノ”宛如初月之形，用入诗中颇见新巧，虽不宜提倡，偶为之则无妨。再如除中秋赏月外，日本风俗九月十三夜亦要赏月，诗家多有吟咏，此亦可谓纯乎“和臭”者，但佳篇不少，正可与中秋诗相映成趣。这样的“和臭”，就是十分可珍视的了。

所谓“和臭”问题，实际上是日本汉诗的创作和批评以什么为标准，以什么为准则的问题。试想，中国诗不存在要避免“汉臭”的问题，日本和歌也同样不存在要避免“和臭”的问题，而且相反，要说“汉臭”，要说“和臭”，恰恰是汉诗与和歌的特色，是它们各自得以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独特价值所在，恰是应当珍视、应当保留、应当发展的东西。日本汉诗之所以须避免“和臭”，正说明它的价值观是以“汉”为标准的。

原尚贤《刻〈斥非〉序》云：

夫是非无定体，人之是而我以为非，我之是而人以为非。是非之争，虽历千载，孰能辨之？予闻诸春台先生曰：“今之

学者，苟学孔子之道，则当以孔子之言为断；为文辞者，苟效华人，则当以华人为法。”此辨是非之公案也。

大宰春台著《斥非》之主旨，即在斥一切不合华人之法者为非，故文中多有“非式也，华人弗为也”，“非礼也，华人弗为也”，“非法也，华人弗为也”之类的断语。虽然太宰春台的态度或许有点儿偏激，但“以华人为法”确是那时日本汉诗人的共识。上文所引江村北海之所谓“不能不承顺汉土”，以及赖杏坪在为泷川南谷的《沧溟近体声律考》所写的序文中所指出的日本汉诗人应当“离和境而到汉岸”的目标等等，也都是同样的意思。

前野直彬、石川忠久在《汉诗解释鉴赏事典》中评论菅原道真的诗云：

汉诗至道真，由模仿而趋于独立性，同时，和臭（日本味儿）也就开始产生了。

评论五山诗僧的杰出代表绝海中津、义堂周信的诗云

他们的诗水准很高而和臭又少。

评论赖山阳的诗云：

山本北山时期高唱宋风，后来此风风靡一世，其中首屈一指者是赖山阳。他以十分成熟的汉诗文工力为基础，自由奔放地进行创作，表现出了日本独自的特色。这与菅原道真的“和臭”不同，可以说这是“日本的汉诗”的完成。

以上三段话，从“和臭”这一特定词语的视角，说明了日本汉诗